

序一面鲜艳的文章文化旗帜

曾祥芹

“唐宋八大家”作为一个影响千古的作家群体，其古文创作和理论历来是中国文坛上一个诉说不完的话题，一个开掘不尽的宝藏。

“唐宋八大家文章学”更换了“散文”研究的文学视角，恢复了“古文”的文章本色，推举出一群卓越的“文章学家”，从而突现了历代文论探讨的拓荒意义，开垦出一片“文章学”的绿洲。

“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以代表中国古代第二个文章高潮的“唐宋八大家”为典型，从他们的文章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出发，按照文章主体、文章文本、文章环境三项内容，初步建构起“文化文章学”的体系，因而更显示出它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价值。

据悉，这个人深见奇的攻坚任务是湖南师大张会恩先生提出

来的。长沙大学周楚汉先生欣然选择了这个黄金般的文章学课题，从 1994 年开始探索，由分到合，稳扎稳打，逐篇发表系列文章，最后结集成书出版；如此“十年磨一剑”，终于磨出了一把锋利的文章学“护神”之剑，为同行学者开辟了一条复兴文章学的康庄大道。

在语文教坛只谈“语言文化”和“文学文化”的学术背景下，作者鲜明地提出“文章文化”的概念，并作出系统地解释，这本身就是对“书面文化”内涵的重要补充，是对语文界“文化偏见”的有力抗争，是对文章学不公正处境的“不平之鸣”。

人们公认，“语言”和“文学”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自从有了“文化语言学”和“文化文艺学”之后，“语言学”和“文艺学”升堂入室，双双焕发出内蕴的人文精神，提高了自身的科学品位。

现在要问：与“语言”和“文学”相区别的“文章”是不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学“能不能进入“文化学”的殿堂？“文化文章学”的建立会给“文章学”的发展带来什么好处？古代“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的探讨会给“现代文章学”的建构提供什么借鉴？周楚汉先生写本书的意图和贡献就在于对上述难题给予了肯定的和令人信服的回答，这是前所未有的开拓。笔者曾经给研究生开过《唐宋文章》选修课，对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作品和文章理论略有所知，但是像本书这样以“分论”谈八大家文章观的差异，以“总论”谈八大家文章观的共识，以“导论”谈八大家文章观的文化底蕴，以“附论”谈八大家文章观的文化余香，确使我感悟到“文章文化”的丰实、博大和深邃。这对文章学研究来说，确是破天荒的创新。我有幸在本书付梓之前拜读

全稿，愿意把读后的粗浅体会先汇报给作者和广大读者，用以进行精神产品再生产的“初次对话”。

各有千秋的文章理念

探讨“唐宋八大家文章学”必须从研读一家一家的全部著作做起，把几千篇文章中的文章思想片断准确抽取出来、有机组织起来，需要下多大的工夫是可想而知的。八篇“分论”的着力点在于辨别出各家的独特建树。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代表“以道德文章伏一世”，他的文体革新的杰出成果，他的古文说、明道说、文气说、尚奇说、善鸣说，继往开来，影响千年文坛。柳宗元主张“兴西汉文章”，明“大中之道”，“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要“炳蔚文采”、“言畅意美”、“有益于世”写作要“感激愤悱”、“卓然自得”批评要“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文论水平和影响与韩愈齐名。欧阳修倡率古文、特别是应用文，他重道而不轻文主张“著气为文”、“文出自然”、“善评文章”，“学至文高”，作者有意突出其一代文章宗师的地位。“三苏”则重点讲苏洵的“事、词、道、法四用”说和“风水相遭为文”说，苏辙的“文者气之所形”说，特别对苏轼“以古文为事”、“文合于道”、“文能达是”、“文理自然”、“文以体用为本”、“博学能文”、“开心见诚”的系统论述，褒扬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完善古文理论。对曾巩则排出他的道法说、事理说、辞工说、史铭说、内外说，尤其是应用文论，补足其研究之不够。王安石作为八大家的最后一位，摆出他“善为古文”、亲注《三经新义》的

成就，阐述其“文贯乎道”、“文言乎志”、文“以适用为本”的主张后，突出他对文章美学、文章哲学和文章风格学方面的贡献。这异彩纷呈、各有千秋的文章见解，展示出八大家的读写个性。

和谐共鸣的文章流派

“唐宋八大家文章学”作为中国文章学史中的一个素负盛名的文章流派，有权威的领袖，有经典的作品，有成套的理论，有趋同的风格，有约定的评价。五篇“总论”（加一篇“附论”）的侧重点在于对八大家比较一致或近似的文章理论进行整合性解释。这种“整合性解释”比单个文章家的思想特色概述要难得多，重要得多。对八大家的文章本体论，作者排出文气、文道、文用、文律、文法、文格、文体“七论”，涉及到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功用，提炼出文章本体的一系列基本范畴，观点大体一致，形成称雄文坛的合力。对八大家的文章哲学观，作者认为，“文所以为理”揭示了文章存在的方式，“辞事相称”肯定了语言和实在的同一关系，“言能尽意”与“言不尽意”明确语言和思维之间统一为主、矛盾为次，“绚烂之极是平淡”道出了文章发展的内在依据，即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文章辩证法，“文以神志为主”与“文以行为本”阐释了文章生产主体与道德水准的互存互促关系，“文有定价”提出了文章价值评估的客观标尺：这些哲理透视均独具慧眼。对八大家的文章美学观，作者发现“气盛言宜”是美的根源，“文与道俱”是美的本质，“言畅意美”和“简

而有制”是美的内容，“刚柔相济”是美的形态，这样纠正了先秦两汉单重内容、魏晋单重形式的偏颇，梳理出一个较为成熟的文章美学体系。此外，对八大家的文章通变观，作者从革新古文内容、创新古文文体、变革古文文风三方面盛赞“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历述了 200 多年唐宋古文复兴运动的辉煌成就。以上“总论”不但高屋建瓴，而且精密周全。如论“文气”的地位作用，认为“气是文章的根本”，一连阐述了“气”与道德、与志向、与创新、与雄辩、与才美、与修辞、与辞达、与简洁等八方面的密切关系，非常精微；如论“文理”的美学意义，认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该做到“理切、理工、理备、理趣、理当、理周、理精、理常”，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透视底蕴的文化眼光

文化是一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存在，它是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把它生硬地解释为实物形态，或者玄虚地解释为意识形态，或者以物态为主、心态为次，都可能造成文化偏见。如今风行的“大文化”概念，就像猢猻那样从身上拔一把毫毛吹一口气，就变成千万种文化，这就是“用文化眼光看，文化便无所不在”。唐宋八大家，作为活着的文章家也许在当时只是文章的生产和生活状态，一旦变为彪炳千秋的历史状态，他们便成为文章文化的活的典范。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言：“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周楚汉先生正是站在现代文章学建设的未来前景的高度去

看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八大家文章学，才揭示了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的精神底蕴。

《唐宋八大家文章理论的文化承传》那篇总论，把“文章文化”视为“反映一定民族的文章精神风貌、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把“文章理论”视为“文章文化的理论精神成果”，据此综述了八大家对传统文章理论的继承、融合、创新和延续。他们高举“复古”的旗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实际以革新文章为目标，其“文以明道”是对荀子、司马迁的传承，其“辞事相称”是对扬雄“事辞称则经”的发展，其“文适于实用”是对王充“文为世用”的升华，其“炳蔚文采”导源于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理化之具”发轫于李汉的“文者贯道之器”，其“不平则鸣”发源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他们有选择地融合儒、道、法、墨、佛、阴阳、纵横、名、杂、农等百家的思想，在广泛借鉴中大有创新，其文章的“义理”和“法度”确立了文章学的理论框架，其“陈言务去”、“文从字顺”、“词必己出”、“文者气之所形”、“风水相遭而为文”、“穷尽事理”、“简而有法”等，筑成了古代文章理论的高峰。唐宋八大家文章理论上承先秦两汉的古文优良传统，下启明代王世贞的“意法”和清代方苞等的“义法”，并给近、现、当代文章理论以深刻久远的影响，表现了中国文章文化的极强延续力。

《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这篇导论，堪称全书的制高点。从作者研究的过程看，是先写“分论”，再写“总论”，后写“导论”。从全书的“金字塔”结构看，是“导论”在先，“总论”居中，“分论”在后，这个布局突出了“创建文化文章学”的崇高

理想。作者认定，文化文章学是运用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章的学问，是研究人们认识、传承、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学问。“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这门特殊的学问，包含三大内容：

关于文章主体的理论，唐宋八大家宣示了“畜道德而能文章”的主张。韩愈说：“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仁义”二字基本涵盖了道德的内容。“能文章”内涵丰富：如韩愈的“陈言务去”、“气盛言宜”、“文从字顺”、“穷情尽变”、“辞事相称”柳宗元的“质文相生”、“旁推交通”、“简而有制”欧阳修的“事信言文”、“繁简适中”、“学至文高”；苏洵的“风水相遭”；苏轼的“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厚积薄发”；苏辙的“养气致文”；曾巩的“驰骋上下”；王安石的“博学能文”，等等，都具有文章读写方法论的意义。作者敏锐地发现，唐宋八大家建构文章主体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是“读百家书”，整合各种文化。如柳宗元、苏轼、苏辙、王安石容佛（尽管韩愈、欧阳修、苏洵、曾巩拒佛），对骈文的借取。此外，柳宗元的“文以尽志”、“以文自娱”欧阳修的“文如其为人”均揭示了文章主体对文本建构的影响。作者从美国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言“文化是大写的人格”得到启发，认为“文章也可以说是大写的人格”。唐宋八大家在文章生产中造就了自己，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铸成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关于文章文本的理论，唐宋八大家提出了“自为一家之文”的见解。他们对古文内容要求“文以明道”、“文以明理”，基于“教化”的需要，其“道”不限儒家之道而容纳百家之道，其“理”不拘一面之理而囊括万物之理；他们对古文形式提出“文

章言语”、“穷言易好”、“直率逆耳之言悦人”、“一言知情”、“文章变体”，很早就觉悟到言语作品受个人意志、经验、交际、情感、文体的制约；他们对古文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提出“通其辞本志乎道”、“文以达理”、“辞事相称”、“言能尽意”、“质文相生”、“事信言文”，深刻地认识到形式服务于内容，内容和形式要相符，内容和形式互相转化；他们对文章的生成提出“风水相遭而为文”、“养气致文”的论断，认识到写作是现实感触搅活了学识修养的结果，文章是“气之所形”、“以养而致”；他们对文章的风格提出“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学术之精微”是风格形成的因素，“雄辞闳辩”和“清音幽韵”是风格划分的类别，“文类其人”和“刚柔相济”说明风格可以辨认，可以互相转化和包容，“刚柔同体，应变若化”说明风格多变在于“能志乎道”。如此丰富多彩的“文章面面观”，足见八大家对“文章本体”认识之全面，对“文章文化”涵养之精深。

关于文章环境的理论，唐宋八大家发表了“文章系乎治乱”的看法。他们断定“文章之变，与时盛衰”，认识到文章文化与社会互动的关系，又觉察到“积习不可骤革”的文化现象，承认文风与社风发展的不平衡；他们从宋代天子重视文章变革、恩威并用，欧阳修借知贡举、知制诰的权威推行古文、效果非凡的史实，总结出“本朝更制，渐复古风”的经验，认识到古文运动获得最后胜利的社会原因在于运用行政权利改变文风，这是异常深刻而富有教益的；他们又以“识通治乱之本”、“深言当世之务”来评判文章的社会价值，反对“荣古虐今”，倡导古为今用，认为文章“陈古今治乱成败”，“辨时俗之所惑”，都是为了“指切当时”，教化今人。这里对文章环境的论述渗透着鲜明的文章文

化社会观。作者把“文章主体”、“文章本体”和“文章客体”连接起来，构筑了“文化文章学”的“三体”理论框架。

古为今用的文章学借鉴

要问“文化文章学”的建立对“文章学”的发展有什么好处？作者认定，把文章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是文章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每一人文科学都是文化的存在形式，文章学一旦变成文化场景中的文章研究，就会大大增强文章学在人文科学体系中存在的合理性。文化文章学的研究，将拓宽文章学研究的视野，丰富文章学的内容，提升文章学的层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面对“文章学”至今尚未被官方列为“社会人文科学门类之一”的落后现实，让学者和世人承认文章学存在的合理性，让文章学进入文化学的殿堂，特别具有启蒙和战斗作用。

我之所以赞赏《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一书，是因为这个课题的确如作者阐述的那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唐宋八大家是一面鲜艳的文化旗帜，在华夏文章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最具代表性，影响着中国百代文章和东亚（如朝鲜、日本）文章文化圈；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的主张具有先进性，标志着我国古代文章学进入成熟期，构筑了古代文章理论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对现代文章学的建构富有整体性的借鉴意义。作者说得好：“现代文章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多半可以从唐宋八大家文章理论里找到源头。”

“唐宋八大家文章理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新文化，是三代两汉传统文章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文化，是当代文章文化传统现代化的基因。”整体性是文化文章学的根本特征之一，既然文章是主体、文本、社会环境的统一，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文章主体、文章本体、文章客体三者构成的整体出发来构建现代文章学。

我们在 21 世纪所要建设的“现代文章学”是以狭义文章（不包含诗词、小说、戏剧）为研究对象的实用文章学，它对以广义文章（包含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古代文章学”是一种变革。现代文章学是古代文章学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不是“复古”，不是唐宋八大家文章学的翻版，而是创新，是对唐宋八大家文章学的扬弃。以文章主体素养而论，“畜道德”的“道德”内容当然要与与时俱进，但是“畜道德而能文章”的文章主体建构理论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以文章本体要素而言，唐宋八大家提出的“文道、文事、文理、文情、文心、文志、文辞、文体、文律、文法、文气、文采、文风、文格、文美、文用、文价、文德”等系列基本概念和多维探究思路是值得我们重新整理和借鉴的。特别是实用文章要讲究文采，追求“言畅意美”，对保持现代文章学的审美品位，是具有“立标定向”意义的。再以文章生存环境而论，运用行政权利变革文风，不失为繁荣文章的国策，如果当今领导吸取唐宋古文运动成功的历史经验，能在重视社会人文科学的氛围下扶植文章学，真正把文章当作“经国之大业”，那么现代文章学的蓬勃发展就大有希望。

中国古代曾经以“文章大国”著称于世，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也应该保持和发扬“文章大国”的光荣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事业中，文章学的复兴是应有之义。从建设先进的文章文化这个背景和前景来看，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的古为今用，就闪射出特有的历史光耀和时代光芒。笔者抑制不住学术开拓的激情来写这篇序言，心里默念着：唐宋八大家构筑了中国古代第二个文章学高峰，我们这些八大家的“追星族”为什么不能于继承中有所创新呢？在当代中国文章学的研究队伍里，没有大家，毕竟有小家，且大家是由小家长成的，集成的，像周楚汉先生这样从“比较文章学”到“文化文章学”的攻坚学者，如果有几十个、上百个，现代文章学的自立、兴旺是满有把握的。

2004 年 5 月 5 日学习节于河南师大

导 论

一 什么是文化文章学

文化文章学是运用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章的学问。而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只有在明确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才有所参照，故而需先对文化进行界定。

什么是文化

给文化下定义是个难事。1952年，美国当代文化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分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六类，列举并分析了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1965年，在莫尔著作《文化的社会进程》里文化定义有250种说法。之后，俄罗斯学者克尔特曼在对文化定义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文化定义已有400余种。克尔特曼之后的定义还不知其数。这说明，一方面文化现象纷纭复杂，各个学科、文化的各个学派见仁见智，给文化定义很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随

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定义有增多的趋势，因为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文化定义也要力求反映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文化事实，这是理论理性应有的品格。因而，依据历史性的发展角度审视文化界说是恰当的。

文化定义不可忽视它的词源学意义。在西方，文化一词源自拉丁语的 *cultura*，具有耕种、训练、驯化、栽培、加工等多种意义，基本义为人们对土地耕耘、改良和开发等，使之适应自己的生存。后来，文化又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有“智慧文化即哲学”的名言，他的智慧文化有改造完善人的内心世界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一词源自《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意为人们运用知识、伦理道德、法规、礼仪规范自己的行为，侧重于人们的精神活动。刘向《说苑·指武》的文化一词就是沿用这个意义：“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根据目前的文化学史文献来看，文化作为独立概念提出并使用是 17 世纪的事情。据尼德曼的研究，第一个这样做的是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

带有哲学色彩的文化定义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提出的，文化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创造”。他的文化定义侧重于精神活动及其成果。

在文化学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定义，是文化人类学创始人、进化论学派的奠基人、英国的爱德华·泰勒提出的，他 1871 年出版

的《原始文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全面，为后来学者所遵循。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文化是“个人心理在社会屏幕上的投射”。他强调，心理活动不仅有有意识的部分，而且还有无意识的部分。他解释说，个人心理的永无止息的冲突具有生物性基础，当它们“折射在社会屏幕上时”，就成为文化方方面面（道德、艺术、宗教、国家、法律等）的主要原因和内容。美国心理文化学派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1934 年发表的《文化模式》指出：“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她认为，文化模式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复合体的整体组织形式，不同的社会文化有不同的形式，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包含多种模式，一种文化具有统一性，这就是文化模式的整合功能，综合的有机体并非各部分的总和，而是一个新的实体。这一派文化观念的合理性在于文化必须有心理参与，因为文化是一种意识。

功能主义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波兰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的文化理论》（1944）认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文化需要的总和就构成了文化。他的所谓基本需要是指人类机体的全部需求，包括人类营养、生殖、卫生需求等，要满足这些需求必须建造新的、次生的人工环境即人的环境，他把它称为文化需要。因而他指出，文化是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结构。

接近心理文化学派的克拉克洪在《人类之镜》（1949）大约 27 页的关于文化概念的章节中，把文化逐次定义为：（1）“一个